doi：10.3969/j.issn.1674-9499.2026.08.001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侨民管控政策下的旅俄华人探析

[俄] B.Г.达旗生[1] 赵慧青[2] 译

(1.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俄罗斯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660041；2.黑河学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根据俄罗斯档案解密的新史料，重新探讨20世纪20年代苏联华侨群体与中苏关系。新经济政策吸引大批华人赴苏，包含务工者、华商与赴苏求学的革命青年，华人主要聚居苏联远东地区，是当地采金等产业的重要劳动力，多数保留中国国籍。苏联政府组织成立华文学校，推行扫盲教育，面向华人开展革命宣传。受苏联工业化、集体化政策影响，华商的传统经营模式发生变动。在该时期华人已成为苏联，特别是远东地区人口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并对当地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旅苏华侨 ；中苏关系；远东华工组织

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26)08-0001-04

20 世纪20年代的华侨移民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俄国内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大批中国人离开苏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华侨选择留居当地。20世纪20 年代，苏俄推行新经济政策后，再度吸引中国移民陆续赴苏谋生。

一、旅俄华侨华人赴苏的历史背景及基本情况

中国赴苏移民绝大多数属于劳务移民，前往苏联的多为中国东北与山东籍务工者，另有少量来自国内各省的商人。同时，还存在政治移民与留学移民：寻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大多从中国南方奔赴苏联高校求学。20世纪20年代，苏联接收了一批来自欧洲各国的中国革命者。例如1925年7月，60名中共党员从法国辗转来到莫斯科。[①]1926年，邓小平自巴黎赴莫斯科深造。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也是典型事例，他在苏联取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1925年末，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派，蒋经国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入学不久便加入苏联共青团，后与冯玉祥之女成婚。1927年大学毕业后，蒋经国前往列宁格勒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继续进修。同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重压之下，他撰文公开声讨父亲蒋介石，并与冯玉祥的女儿解除婚约。

20世纪20年代，苏联境内华人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据档案记载，1923年远东边疆区登记在册华人50 183 人，1925年增至57 167人。[②]1926年，整个远东边疆区华人登记人数达7.2万人。[③]莫斯科形成了人数较多的华人移民社群（区），1928年，当地华人约8 000人。列宁格勒居住的华人达500名以上；原在俄欧洲部分北部务工的华人也定居于周边各地。俄国内战结束后，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留存了大量中国移民；乌克兰地区华人总数约7 000人。[④]

苏联的华人社群成员几乎清一色为男性。依据1926年全苏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西伯利亚，在册苏联籍华人男性1 360人，而女性仅为49人；外籍华人共计2 129人，其中女性只有22人。[⑤]绝大多数华人聚居在城镇。

20 世纪 20 年代，大量华人因失业原因纷纷另谋生路。多数华人转向小本经营，以手工卷烟、日用小商品贩卖为生。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为例，1926年，当地在册华人共3.4万人，其中仅有1万人为华工。[⑥]

二、苏维埃政权侨民管控政策对华侨华人的影响

移民管控政策的放宽推动了中国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相关学者指出：“外国人申领苏联临时护照（居留证件）的办理地点，从边境口岸改至边疆内陆地区；证件审批办理时限延长至两个月。”[⑦]苏联各级国家机构难以对华人移民实

①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920–1925. – М., 1994. – С. 605.（引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文献》第 1 卷，1920—1925，莫斯科，1994 年，第 605 页）。

②ГАПК. Ф. 791. Оп. 2. Д. 3. Л. 90–91.（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 791，目录 2，案卷 3，页码 90-91）

③Киреев А.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серед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I вв.). –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1. – С. 137.（基列耶夫·A.A.《俄罗斯远东边境：形成与运行趋势（19 世纪中叶 —21 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2011 年，第 137 页）。

④ГАДО. Ф. Р-1146. Оп. 2. Д. 270. Л. 19; Ф. Р-2109. Оп. 1. Д. 138. Л. 17.（敖德萨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Р-1146，目录 2，案卷 270，页码 19；全宗 Р-2109，目录 1，案卷 138，页码 17）。

⑤Почти половина «китаянок» указал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качестве родного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26 г. Т. VI. Отд. 1. – М., 1928. – С. 12).（近半数登记在册的“华人女性”将母语一栏填报为俄语，引自《1926年全苏人口普查》第6卷第1分册，莫斯科，1928年，第12页）

⑥ГАХК. Ф. П-2. Оп. 2. Д. 47. Л. 41.（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П-2，目录 2，案卷 47，第 41 页）

⑦Киреев А.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серед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I вв.). –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1. – С. 165.（阿·阿·基列耶夫《俄罗斯远东边境：形成与运行趋势（19 世纪中叶 —21 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2011 年，第 165 页）。

收稿日期：2026-06-14

基金项目：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俄国/苏联远东地区中文教育史研究（1860—1938）”（24BZS131）

作者简介：B.Г.达旗生（1964—），男，俄罗斯人，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俄关系史、旅俄华人史、俄罗斯汉学史研究；赵慧青（1980—），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旅俄华人史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施有效监管，如1926年阿穆尔州境内约65%的华人未办理落户登记。[①]而华人劳务移民的发展同样面临阻碍，1924年，《阿穆尔经济生活》期刊提及：“因护照税费高昂，出现华工短缺现象。”[②]

20 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东部地区对华工的用工岗位需求稳步回升，重现沙俄时期景象，吸引了大批华人来此务工。1928年3月2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准许为远东黄金开采业引进2 000名工人（朝鲜籍与中国籍劳工）。”[③]同期苏方还计划开展更大规模的招工，拟引进约9 000名华工，[④]但这项大规模引进劳工的方案最终未能实施。苏方在中国境内私自非法招募劳工，促使中方加强边境守备。苏联黄金联合公司代表曾两度同中国官方磋商招工事宜，但最终并未达成合作。此后有苏方公司试图委托华商通过轮船偷运华工入境；先后五批总计500余名劳工在拉哈苏苏被中方查获，涉事中方商号负责人受到制裁，其余华商此后均不敢再承接此类偷渡招工业务。自此苏联招工人员只能在苏联境内，经由在苏华人开展招募工作。[⑤]

在苏联的绝大多数华人仍保留中国国籍，并有长期留居苏联的打算。据《西伯利亚苏维埃百科全书》所载1926年人口普查数据：远东边疆区境内，拥有苏联国籍的华人3 815人，中国籍华人达68 190人。1925—1926年远东地区入籍苏联的外籍人员中，朝鲜裔占99%，华人仅占0.7%。[⑥]除此之外，在滨海边疆区偏远闭塞地带，华人仍沿袭半世纪以来的生活传统，依照民族习俗和惯例自治生活。学者伊·阿·洛帕京记述：“乌苏里边疆区原始密林深处的华人拥有独立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与裁决机制；身处苏联领土，但实际上仍遵行本国律法，甚至当地的奥罗奇原住民也受其规约约束。”[⑦]1926年，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张维致函询问当地华人入苏籍人数，2月12日边疆区执委会复函称：暂无华人申请加入苏联国籍的登记记录。[⑧]

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华人最终加入了留居国（苏联）国籍，入籍缘由各不相同。居住在米努辛斯克的王临玉（音译）在入籍申请书中写道：“因家境贫寒，无力返回祖国，恳请批准我加入苏联国籍。本人承诺恪守苏联各项法律。”[⑨]

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多个地区与国民经济行业中，华工用工规模日渐庞大，部分行业甚至占据用工主体。1925至1926财政年度，远东边疆区黄金开采业在岗华工共计4 177人，占到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的50%。其中阿穆尔地区采金矿工里，华人占比高达 91%。[⑩]1924年春季，雅库特南部新建的“无产者”金矿投产，在册华工150余人，约占矿上工人总数的1/3。[⑪]1923年4月,阿尔丹金矿发现金矿资源后，矿区务工人员主体是华人。

20 世纪20年代中期，伴随着中苏关系趋于正常化，苏联出台多项举措，用以改善在苏华人的居留处境。1925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省行政部门下发文件，要求所有在苏华人更换原有护照、申领新式国际身份证。随着中国领事机构恢复常态化办公，华人移民管理局势逐步趋于平稳。但苏联各级机关处理涉华事务阻力重重：无论是官方行政体系还是民间社会，都极度缺乏汉语翻译人才。

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商会是发展稳固、颇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组织。192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行民营中文周报《华商报》（音译：Чжан-Куа-Шан-Бао），每期印量300份；据《全西伯利亚名录》记载，该报是当时苏联亚洲领土范围内唯一一份纯粹由华人创办的华文报纸。1927年春，苏联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Ф.Д. 梅德韦季向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书记Я.Б.加马尔尼克汇报，称“华商上层势力依托中国各领事馆形成派系集团”。赤塔的华人商会也属这类组织：名义上已遭取缔，实则在地下秘密运营。档案文件载明：“各类华商会的活动内容为：聚集全部华人商户与手工业者（私营资产所有者），协同对抗苏联国营商贸资本；吸纳华人商号普通雇工，阻挠其加入苏联工会及各类苏联社会团体，并为中国领事馆提供资金扶持。除此之外，领事馆依托这些商会在华人社群中推行各种有利于自身的举措，商会实质上沦为领事馆管控华商与手工业群体的附属机构。”[⑫]

20世纪20年代，苏联中央与地方政权彻底放弃了华人自治的构想，将在苏华人的管控权责划归苏联国家机关与工会组织。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苏华人工会停止活动。1924年9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开会，成立了“不许干涉中国！” 协会，该组织随后在苏联全境设立分支机构，承接了在苏华人相关组织管理的部分职能。协会协助旅

①Киреев А.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серед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I вв.). –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1. – С. 165.（阿·阿·基列耶夫《俄罗斯远东边境：形成与运行趋势（19 世纪中叶 —21 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2011 年，第 170 页）。

②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Амура. – 1924. – №1. – С. 19.（《阿穆尔经济生活》，1924 年第 1 期，第 19 页）。

③ГАХК. Ф. П-2. Оп. 1. Д. 76. Л. 197.（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П-2，目录 1，案卷 76，第 197 页）。

④ГАХК. Ф. П-2. Оп. 1. Д. 112. Л. 106.（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П-2，目录 1，案卷 112，第 106 页）

⑤Кочегарова Е.Д. К вопрос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в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30-е гг. XX в.) //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х рубежах. 3. –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2002.（叶·德·科切加罗娃《关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远东采金业使用华工问题》，收录于《远东边界上的俄中两国（第 3 辑）》，布拉戈维申斯克，2002 年）

⑥Отчет Далькрайисполкома за 1925-26 г. – Хабаровск, 1927. – С. 28.（《远东边疆执行委员会1925—1926年度工作报告》，哈巴罗夫斯克，1927年，第28页）

⑦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И.А. Лопатин писал: «Китайцы в глухих местах тайги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имеют свою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ю и суд, и, находясь на рус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ни, в сущности, живут п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ам, каковым подчиняют и тузем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орочей» (Лопатин И.А. Орочи – сородичи маньчжур. – Харбин, 1925. – С. 11).（洛帕京《奥罗奇人：满洲人的同族》，哈尔滨，1925 年，第 11 页）。

⑧Воронов И.А., Кузнецов С.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ьства в Иркутске в 1926 г. // Вестник ВСГУТУ. – 2013. – № 2. – С. 1508.（沃罗诺夫、库兹涅佐夫《1926年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的活动》，载《东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508页）

⑨ГАКК. Ф. Р-49. Оп. 3. Д. 87. Л. 54.（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 Р-49，目录 3，案卷 87，第 54 页）。

⑩Кочегарова Е.Д. К вопрос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в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30-е гг. XX в.) //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х рубежах. 3. –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2002. – С. 378.（叶·德·科切加罗娃《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远东采金业雇佣华工问题》，收录于《俄中两国在远东边境》第3辑，布拉戈维申斯克，2002年，第378页）

⑪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Амура. – 1925. – № 2. – С. 75.（《阿穆尔经济生活》1925年第2期，第75页）

⑫ГАХК. Ф. П-2. Оп. 1. Д. 66. Л. 144.（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П-2，目录 1，案卷 66，第 14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居苏联的华人开展政治宣传与文教普及工作，并从物资、技术方面保障莫斯科华文报纸《前进报》的出版发行。赤塔设立了专门的远东劳动监察专员机构，当地政府依托该机构督查劳工权益、生产及居住卫生规范的落实情况。至1927年，苏联已翻译中文版《劳动法》及多部劳动法配套细则。

三、旅俄华侨华人在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

旅居苏联的华人社群衍生出诸多问题，这类弊病也是当时华人移民群体普遍存在的现象。吸毒、赌博是华人聚居区十分突出的陋习。据同时代资料记述，远东地区90%的土匪都和鸦片种植、鸦片炼制密切相关。1925年，远东地区被判处刑罚的华人共计3 074人，占当年全部受审人员总数的18%。[①]1926年4月，顿巴斯地区朝鲜籍、华籍党务骨干地区工作会议作出决议："严厉整治装病怠工、无故旷工现象；在华人当中大力根除各类不良陋习，严查证件买卖与租借、赌博、侵占他人钱财、吸食鸦片，以及党员无故缺席党组织会议等问题。"[②]

档案留存的相关文献证明，当时存在有组织的华人犯罪团伙。1926年2月25日《关于活跃于西伯利亚的华人匪案侦讯案卷辑录》记载：叶尼塞省已有14名华人遇害，另有20余名当地华人被列为命案凶手与涉案嫌疑人。该犯罪团伙的活动范围涉及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鄂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多个城市。[③]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方情报机构（地下情报组织）仍在苏联远东地区持续开展活动。1927年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处的工作报告中记载："已有确凿线索证实，中国反动势力企图依托各类华人宗教社团在苏联境内开展政治谍报活动；遵照奉天方面的指令，各驻华领事馆已于当年春季从社团成员中招纳情报人员。"[④]

尽管旅居苏联的绝大多数华人仍保有中国国籍，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仍对该群体高度关注。散居于苏联民众间的华工与华商，同当地文化、地方政权的联系较少。当地报刊曾报道："在华人中开展工作困难重重。虽设有华人俱乐部，可是缺少通晓汉语的工作人员，华人自身又不懂俄语……"。[⑤]此类局面不但制约了苏共与苏维埃政权面向华人开展工作、吸纳华人投身苏联建设，还加剧了跨民族矛盾冲突。

20 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各级机关加紧推进工作，吸纳华人参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陆续选派华人移民进入省级苏维埃党校学习。莫斯科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苏联针对华人开展党务政治工作的两大核心阵地。1925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省级苏维埃党校下设华人部（初名苏兆征党校，后改称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级苏维埃党校，1929年，更名为海参崴中国列宁学校。华人列宁学校校长为张锡俦（俄文名：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桂斯基），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

和俄远东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一样，面向在苏华人的扫盲普及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面展开。一些华工因劳作繁忙无暇学习，加之不懂俄语、文化程度低，政治素质不高，因而不愿入学。博尔贾区有色金属黄金管理局矿区工作报告记载："无论俄语班还是华文扫盲班，学员都存在出勤较少的情况。原因是日常劳作超负荷；或受反革命宣传蛊惑，坊间散布传言，称但凡入学识字者日后都要被强征入伍等。"[⑥]1925—1926学年，哈巴罗夫斯克开办为期三周的远东扫盲师资特训班，培训出17名朝鲜籍、10名华人扫盲教员。1927—1928学年，远东地区印制发行成人华文识字课本，印数5 000册。

20 世纪20年代，苏俄陆续翻译刊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苏联领导人的著述、各国共产党人作品以及各类华文教材。远东边疆区工会理事会机关报（1929年后同时作为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机关报）《工人之路》（《工运之路》，音译：Гунжэнь чжилу）自1922年3月起每周刊行，1928年改为一周两期。1925—1926年间，莫斯科出版华文报纸《前进报》（《前进报》Цяньцзинь бао）。[⑦]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报刊不仅在苏联境内发行，还发行到国外；1926年，法国警方搜查邓小平在巴黎的住所时，便查到过这批报刊。[⑧]1918—1937年间在苏联先后创办发行20余种华文报刊。[⑨]

联共（布）与国民党关系走向恶化的时段，恰逢在苏华人开始深度卷入苏联内部政治斗争，二者之间或存在直接关联。如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国留苏学生同苏联托洛茨基派人士一同打出"拥护托洛茨基打倒斯大林"的标语。多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对苏联教员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对于不认同当时主流极左观点的同学，斥之为尾巴主义者，甚至辱骂为"俄国走狗"。1927年，远东地区的中共党员内部爆发派系纷争。华人党支部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派由外来同志组成，大多是南方出身的知识分子；另一派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同志（西伯利亚派），他们或是政治理论素养薄弱、或是文化水平较低，籍贯多在中国北方。"[⑩]1927年，哈巴罗夫斯克曾开庭审判一名被控从事恐怖活动的华人中共负责人，这一案件或许就和上述派系矛盾有关。[⑪]

①Ларин А.Г. 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 М., 2003. – С. 133.（阿·格·拉林：《俄罗斯的华人：往昔与今朝·简史》，莫斯科，2003 年，第 133 页）

②ГАДО. Ф. Р-2109. Оп. 1. Д. 138. Л. 154.（敖德萨州国家档案馆，全宗 Р –2109，目录 1，案卷 138，第 154 页）。

③АГМ. Ф. 369. Оп. 1. Д. 9.（莫斯科国家档案馆，全宗 369，目录 1，案卷 9）

④ГАХК. Ф. П-2. Оп. 1. Д. 66. Л. 145.（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П–2，目录 1，案卷 66，第 145 页）

⑤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рабочий. – 1925. – 6 октябр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报》，1925 年 10 月 6 日）。

⑥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154. Д. 433. Л. 2об.（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 495，目录 154，案卷 433，背面第 2 页）。

⑦Всего вышло 20 номеров, тираж которых составлял несколько тысяч экземпляров总计发行20期，每期印数数千份

⑧Барач Д. Дэн Сяопин. – М., 1989. – С. 42.（Д. 巴拉奇《邓小平》，莫斯科，1989年，第42页）

⑨Чугуевский Л.И. Периодическая печать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в СССР (1918-1937) //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 1959. – № 4. – С. 71–76.（Л.И. 丘古耶夫斯基《苏联华文定期出版物（1918－1937）》，载《东方学问题》1959年第4期，第71－76页）

⑩ ГАХК. Ф. П-2. Оп. 1. Д. 367. Л. 265.（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П-2，目录 1，案卷 367，第 265 页）

⑪ГАХК. Ф. П-2. Оп. 1. Д. 65. Л. 157–178.（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П-2，目录 1，案卷 65，第 157–178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当局愈发重视面向华工开展政治宣传工作。1927年，伊尔库茨克一家纺织厂召开声讨蒋介石叛变行径的群众大会，与会者通过呼吁书：“我们共产党应当进一步加强工作，引导中国工人像苏联那样掀起一场革命运动。”[①]20年代末，赤塔划拨三处房产用来建立华人俱乐部，其中一栋原为民众之家剧院。1924年，莫斯科正式成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协会设立中央理事会作为领导机构，并于1927年9月通过协会章程与年度工作计划。

尽管苏联党政机关十分关注华人移民群体，但华人加入苏共或各类社会团体的情况寥寥无几。华人社群生活相对封闭，绝大部分旅居苏俄的华人固守本土传统文化，各类兼具宗教与社会属性的民间组织也得以留存。1927年苏联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处的报告记载：“但凡有华人定居的远东边疆区城市，均设有华人佛教社团。这类社团受中国本土相关总部统筹管理，由国内机构主导运作。佛教社团历史渊源深远，已存续数十乃至数百年，本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传承着中国传统民间祭祀活动。”[②]

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全面开启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与文化建设改革时代。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背景下，华人赖以生存的传统小商品市场经济环境不复存在。1929年末苏联出台政令，要求以种菜务农为生的华人种植户，将农产品的剩余利润按照国家固定价格交售给合作社。[③]20年代末启动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举措对在苏华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此事引发当时中国政府关切，也给中苏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四、结论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华人已是苏联、尤其远东地区人口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苏联在秉持世界革命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理念、以民族建设为核心任务，推进民族建设核心任务的背景下，缓和了华人移民带来的各类涉外与族群矛盾。20年代旅居西伯利亚的华人被迫更深层次地融入苏俄社会，出现了在文化、经济层面逐步融入当地生活的发展趋势。但绝大多数华人仅将苏联视作临时栖身之地，他们适应环境并非打算长久定居，只是为暂时谋生度日。随着中苏交往重新恢复，一部分华侨重拾十月革命前就已形成的传统生存模式，依旧沿用旧时办法在西伯利亚谋求生计。

A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in Russia Under the Soviet Exile Control Policies in the 1920s

[Russia]Datsyshen V. G. [1] Zhao Huiqing [2]
(1.Siberial Federal University, krasnoyarsk 660041, Russia; 2. Heihe University, Heihe 1643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newly declassified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Russia,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the 1920s. The Soviet New Economic Policy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migrants to the Soviet Union, including laborers, Chinese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ary youth pursuing further studies. Primarily residing in the Soviet Far East, these Chinese migrants constituted a vital labor force for local industries such as gold mining, and the majority of them retained their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Soviet government established Chinese-language schools to carry out literacy education and conduct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targeting Chinese residents. Affected by the Soviet polici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llectivization,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 models of Chinese merchants underwent profound 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overseas Chinese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the Soviet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the Far East region, and exert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oc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life.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China-soviet relations; Far East Chinese workers' organizations

[责任编辑：万红]

① ЦДНИ ГАИО. Ф. 16. Оп. 1. Д. 270.（伊尔库茨克州国家档案馆社会政治文献中心，全宗16，目录1，案卷270）
②ГАХК. Ф. П-2. Оп. 1. Д. 66. Л. 145.（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П-2，目录 1，案卷 66，第 145 页）。
③ЦДНИ ГАИО. Ф. 16. Оп. 1. Д. 1477. Л. 84.（伊尔库茨克州国家档案馆社会政治文献中心，全宗16，目录1，案卷1477，第84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